目　录

1·幸福的回忆、力量的源泉　蔡钦明(1)
2·辛亥革命时期刘承烈、刘文锦参加革命活动事迹片断　刘惠群(6)
3·益阳市解放前文教事业之概述　张德阶(12)
4·“资水文明”四百年——益阳龙洲书院的今昔　蔡济湘(29)
5·益阳发现的古瓷窑址　盛定国(38)
6·益阳的“渣滓洞”——王家大屋　陈乐群　魏新明(46)
7·益阳故城考略　吴锦星(53)
8·益阳城垣街道的废兴　龚　宽(56)
9·益阳郊城三十里迎解目击记　臧福南(61)
10·抗日战争时期龙师学生生活片断　邓显祥　刘仲和(66)
11·益阳油业行商简史　鄢纪纲(75)
12·曾海楼传略　姚松泉(78)
13·忆伯父龚浩　龚应红(88)
14·旧闻拾遗三则　殷光谦(95)
一、蒋汪合流的一段轶事
二、大庸部队火烧三里桥
三、吴尚之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幸福的回忆　力量的源泉

——忆胡耀邦书记视察益阳市九中

蔡钦明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学校党支部得到上级一个令人喜出望外的通知：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将于明天来我校视察工作，了解师生学习、生活情况，请准备汇报和接待。中央领导同志来我们这样一所普通中学来视察，大家都感到非常兴奋，但又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儿紧张。

一、“不要这个”

三月十八日上午，天气是那样晴朗。资江两岸，柳枝青翠，油菜花黄。胡书记由益阳市出发，乘一艘普通的小汽艇沿江而上。行四十余里达到新桥河镇，在学校前方一百米左右的沙咀上岸。陪同来视察的有省团委副书记姜保胜同志，常德地委副专员张立栋同志，地区团委书记崔石麟同志，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同志等及两名保卫人员。胡书记一路谈笑风生，沿着弯曲的山坡小道健步来到学校，学校党支书陈德清等同志前往迎接。大家一看，胡耀邦同志身着便装，脚穿布鞋，朴素极了。胡书记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被领进了学校西侧的小会议室。当时学校条件不好，桌椅粗陋，出于礼节，我们在会议桌上铺了一块雪白的桌布，上面放了一盆

花。胡书记看了看，再小心地把桌布折起来，微笑着说："不要这个。大家坐下随便谈谈。"他的话语那么亲切，态度那么谦和，使在座的同志原来紧张拘束的情绪立刻消除了。

二、"大家辛苦了"

胡书记坐下来，深情地看了看在座的老师，亲切地说："同志们，我是来看望大家的。你们辛苦了！"听了这短短的两句话，不少老师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是的，我们这些普通中学教员，做的是极平凡的工作，然而中央领导同志这么关心、重视我们，这怎么不叫大家感慨万千呢！

接着，耀邦同志向学校党支部陈德清同志详细询问了老师、学生的基本情况，学生们书读得怎样，一天学习几小时，开些什么课程等。陈一一作了汇报。这时胡书记又面对在座的师生说："大家实事求是地谈一谈吧，有什么就说什么，了解情况，回去向中央汇报。"老师们一一谈了些情况，胡书记不时点头微笑。这时，胡书记到来的消息已在全校传开。师生们都渴望见到胡书记，从门口挤进会议室的人越来越多。陈德清同志请胡书记与全校师生见见面，作点指示，常德地区张专员也帮着代师生们提要求。胡书记沉思了一下，谦逊而爽朗地说："好，见见面吧。"

三、"要说真话"

集合铃响过不到三分钟，全校师生已整齐地站在学校西侧小礼堂等候胡书记讲话，里面静得连彼此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楚。这些来自山村角落的中学生注视着这位北京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只见他那么平易近人，那样朴素，个个睁大了眼睛。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肚子吃得饱不饱？”谁也没有料到胡书记这样平常朴实地开始了他的讲话。

“吃得饱！”一部分大胆的同学齐声回答。

胡书记笑了笑说：“要说真话。不饿是假的。不过你们觉悟很高，能克服困难，这种精神很好。”他停顿了一下说：“我们要重视困难，不害怕困难，克服暂时困难。”

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暂时困难时期，我们这所有几十年历史的原“育才中学”（当时是县三中，后改为市九中）有一千多名师生住校，粮食、食油、蔬菜和烧煤都缺乏，困难确实不少。

胡书记的轻言细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排除万难的志气，使师生们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比起红军长征，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我们一定能克服这暂时困难，搞好教学，办好学校！

四、“国家需要人材”

胡书记生动风趣的讲话使师生们毫无拘束，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笑声不时打断了他的讲话。他话锋直转，谈到了学习问题。

“我们暂时有困难，但我们眼光要放远些。以后经济建设要大搞。搞建设国家需要人材，老师们有知识，而知识是宝贵的财富，你们要努力教好学生。”

“同学们要努力学习，做到思想好，有知识，身体棒，懂技术，备为国用！”

……

胡书记给我校师生作了约四十分钟报告。他语重心长的

话，讲到了师生的心坎上。在知识并不怎么值钱的那个年代，胡书记肯定了知识是宝贵的财富，这对老师是极大的鼓舞，使大家更加体会到教好学生的责任之重大和光荣。学生们则更加明确了方向。报告以后，各班组织了讨论，有的班把“思想好，有知识，身体棒，懂技术。”这十二个字写成横幅标语，张贴在教室后墙。现在回忆起来，我们亲切地感到：胡书记的讲话融合了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教育思想，强调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普通高中学生也要具备劳动技术。这在当前仍然是我们搞好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备为国用”，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师生在这虎形山下，资江之畔努力锻炼和学习。

五、“要过细做好学生的工作”

当时我们学校正在贯彻党中共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动员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回乡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当学校党支书陈德清同志汇报到贯彻“八字方针”情况时，胡书记强调说：“老师要过细作好学生的工作。被动员回乡生产的学生一定要本人及家长思想通，不通的留下来，思想通了一个走一个。”

胡书记还亲自找了一个姓崔的学生（新桥河乡列公桥村人）谈话，他说：

“听说你表现很好，并愿意回乡充实农业第一线，是不是真正愿意？如果现在没有想通，我可以写个条子给你交校长，可以留下来读书。”小崔向胡书记表示：现在国家有困难，生产队和家里都缺少劳动力，愿意回乡生产。

胡书记满意地点了点头，鼓励他回乡务农，并努力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道路一样宽广。

视察完毕离校时，胡书记又再三对学校行政人员嘱咐："这位小崔同学是否思想真正通了？学生回乡了，还要很好的培养，树立典型。"以后这位姓崔的同学高高兴兴回到了家乡，发挥了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作用，表现很好。

在短短几个钟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耐心细致作好思想工作的光辉榜样。今天情况虽然变了，经济建设的高潮真正已经到来，但胡书记耐心细致地作好思想工作的榜样和指示永远值得我们效法和遵循。

一九六一年三月到现在，二十多个春来秋去。在这里学习的学生毕业一批又一批，在这里工作的老师几经异动，然而胡耀邦书记对师生的关怀和教导，好似力量的源泉，鼓舞着我校师生共同努力办校和学习。当年幸福地受到胡耀邦同志接见的学生，现在大多数成了各条战线的中年骨干。恢复高考制度后，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的六年中，我校先后有三十一个高中班计一千八百九十九人毕业。其中九百八十五名学生考入了高一级学校学习，有的继续深造考上了研究生或出国留学，有的在高校毕业后成了工程师、企业家。而多年来陆续回乡的毕业生，在农村找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其中一大批成了市（县）、乡、村的企事业干部、民办教师、乡村医生、拖拉机手或者专业户。

资江之畔，虎形山下培育的桃李已布满天下。而今天，一个山花烂漫的教育改革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市九中的教师牢记着三月十八日这一光荣而幸福的日子，牢记着胡耀邦书记的教导和关怀，决心使学校教育坚持"三个面向"，为四化建设培育更多合格人材。

辛亥革命时期刘承烈、刘文锦参加革命活动事迹片断

刘惠群

刘承烈、刘文锦兄弟均系辛亥革命先驱者，原益阳桃江区舒凤乡人。

刘承烈、字绍裘，出生于一八八一年。青少年时代，先后在本县龙洲书院及长沙岳麓书院求学。二十岁左右，因其父刘翌宾在甘肃省任知县，乃随父前往就读于甘肃省城兰州某书院，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

当他在兰州读书时，恰值谭嗣同由内地赴新疆，途经该地，在甘肃之湖南人士，设宴于两湖会馆以表欢迎，刘承烈亦参加宴会。谭嗣同即席发表演说，宣传君主立宪。因当时革命思想尚未普及，刘亦未为所动。待后来到日本留学，因留学生中绝大多数已接受革命思想熏陶，故常有学友邀他去听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演说，并经常阅读章太炎等人主办之革命刊物，至此时思想大为转变，认定必须推翻满清王朝，进行革命，方可挽救国家，造福人民，乃毅然加入同盟会，并与学友一道劝说在他之后到日本的留学生参加革命组织。

刘承烈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并未立即回国，留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与胡汉民、戴季陶、居正、覃振、汪精卫等人共事，并与黄兴、宋教仁、蔡锷、陈英士、章太炎诸人

甚为接近，友谊很深。

同盟会曾在南方各地发动几次规模不大的起义均告失败，乃决定于一九一一年春在广州大举起事，由黄兴担任总指挥，先期赴香港主持军事准备工作。在日本的很多同盟会会员相继离日赴港，刘承烈亦奉总部之命到香港，参加黄兴所主持的作战会议。会上刘承烈与会员数人被指派担任后卫，以期在作战中保卫黄兴及指挥机构的安全。起事前二天，起义人员潜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夜起义爆发，革命同志分路进攻两广总督官署、水师行台及军械局等处，但因力量悬殊，且联络亦不甚周密，致未奏效，反遭满清官兵围攻。清军封锁通道，堵截追捕革命党人，革命同志奋不顾身，激战一夜，终以寡不敌众而败退，黄兴负伤，只身脱险。刘承烈在战事中奋勇向清军射击，自夜至晓，子弹射完，又与友军先去联系，乃只身转入小港，由水道涉水出城，秘密雇一小帆船到香港，再返回日本。此次战役牺牲革命同志达七十二人，后葬于广州黄花岗，故称为黄花岗之役。

是年（即一九一一年）秋，同盟会派一批会员赴北方各省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以策应南方之革命起事，刘承烈亦为被派遣者之一。他由日本乘轮船到天津后，化名为李惕生，即转往河南、陕西、山西各省，配合于右任、阎锡山等人，联络清军镇统吴禄贞，并罗致地方宗教帮会，暗中发动群众，以积蓄力量，待机起事。

有一次，刘承烈在河南洛阳一带从事秘密活动。因事机不密，遭满清洛阳知县派兵警追捕，由民众掩护走避至乡间，终未能摆脱其魔爪，致遭捕获，被缚于牛车之上，押解洛阳。方行至城外，恰遇新军某标有一营部队调动，亦行经

该地。事有凑巧，该营营长张钫原系日本留学生，在东京时与刘承烈相识。他在马上瞥见这一情景，心知其故，乃称刘承烈为他军中的文职人员，质问兵警何以擅加拘捕，当即以武力将洛阳县警兵扣押，刘乃得随其部队乘火车至郑州，转往他地而脱险。

武昌起义后，黄兴急电同盟会在北方各省的同志来武昌担任工作，刘承烈乃由河南绕道鄂西，化装为商贩乘民船自汉水而下至武昌。黄兴即派刘到湖南新成立的革命政权都督府，任实业局（厅）司长。刘承烈到任后，即着手恢复发展醴陵瓷业，成立瓷业公司。同时还拨出大量财力人力，完成株萍铁路的未竣工程，运出萍乡之煤。当时革命军与清军的战事尚未停止，北方铁路不通，运萍乡之煤以支援武汉、长沙等地，对安定民心，巩固革命政权有着重大意义。

刘文锦，系刘承烈之胞弟，字曙汀。光绪年间考入陆军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分配来湖南新军中工作，初任排长，以后逐级荐升，辛亥革命后晋升为陆军少校。刘文锦在保定军校时已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加入兴中会；来湖南后又与黄兴取得联系，受黄兴影响甚深，以后两人竟成好友。

辛亥武昌革命爆发，炮声一响，全国震动，湖南以近在邻省，所受影响尤大。更以湘鄂两地革命志士早有密切联系，人员往来频繁。故武昌义旗一举，湖南方面即能紧密配合，率先在长沙发难响应，时距武昌起事不过十日。

武昌起义前，在湖南省垣长沙驻有新军两个标（每标约相当于一个步兵团），即第四十九标与五十标，刘文锦任第四十九标标统（相当于团长）而满清绿营兵不过数百人，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在兵力上居于绝对优势，完全控制了长沙防务。

驻湖南新军中的军官，初时同情革命者并不多，经过刘道一、刘文锦等人数年间的广为联络招引，或利用假日邀游名山，或以朋友身份见访，长谈于密室，将革命大义宣传开导，遂使军官绝大多数（尤其是下级军官），皆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故能于临期发难，一举即成。

在湖南的革命团体，与设在武汉的地下革命机关，须保持密切的联系，刘文锦本人有时因要事不能不自去武汉，以与刘公、孙武、蒋翊武等人会商革命进行机宜。但为避免引人注目起见，只好化装成普通小商贩，挤在客货混合车中。然而时间一长，次数一多，似此还不足以保证安全。幸当时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之间已通车，广大铁路工人，革命热情甚高，有一次刘文锦赴武汉，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化装成火车机车司炉工人，身穿工作服，满脸煤灰黑污，使外人不能辨认，到武昌后待至夜间，始洗脸更衣外出。可是满清官吏，对新军暗中监视甚严，对刘文锦的一些活动，已有所察觉。在巡抚署内的革命同志，将此风闻传出，迫使刘文锦本人不便擅离长沙，以后有几次是派亲弟刘麦岐（当时由刘文锦推荐在补充营某连任司务长），持他的亲笔**绒札**，代他去武汉与革命机关的负责同志接洽。

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革命，本由临时被迫仓促起事，举事前夕，并未对湖南方面颁发指示与计划。消息传来，新军中官兵上下，皆弄不清事态发展。为了摸清真实详细情况，刘文锦乃急派刘麦岐连夜乘车赶往武昌，向革命领导同志请示机宜，只两日返回，带来多项具体指示，使在长沙的革命同志立即加紧筹划起事，以极其神速的行动决定湖南局面，迅即

抽派部队组成援鄂军，驰赴汉阳前线与清军作战。这对于武昌新诞生的革命政权，军心民气，都给予了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起事前两天，曾秘密召开两个标连长以上军官会议，经一整夜之详细研究，制订出周密的作战计划，湖南军械局被列为重要占领目标之一，因其中贮存枪械数千枝，以及弹药数百箱，恐被满清官吏闻讯予以爆炸破坏，故必须完整无恙地占领。在会上指定四十九标某连连长刘安邦担任此项任务，（刘安邦为刘文锦族弟，原益阳县桃江区之窑湾人，窑湾现为桃江县双汉公社）。刘安邦接受任务后，在起事之夕，趁深夜黑暗中，率部摸近军械局，即展开兵力，以一部由屋后架木梯越墙而入，一部在前面冲破大门而进。军械局有守兵数十人，于睡梦中突被惊醒，尚不知发生何事，未发一枪一弹，就悉数被擒，所以枪械弹药皆丝毫无损。故于胜利后迅速招募新兵数个营，扩充兵力，配合老部队编组援鄂军，全力支持武昌，乃能不用愁械弹之缺乏。

新军中有小部分骑兵，马匹按规定每隔几年须更替一部分。当时新军领导人向满清官吏提出，须往内蒙古购马，并推派刘文锦率数人前往，真实用意是要经武汉再往北方各省联络革命同志。但狡猾的满清官吏，因出于对刘文锦等人的猜疑，乃将计就计，声言湖南巡抚只能呈报两湖总督，须到武昌总督官署换开公绒，方可前去内蒙古。但革命后由所缴获的案卷内查出，实则湖南巡抚已密电两湖总督，待刘文锦等到后换文时，必予以严加拷问，或将其监禁，或径予加害。幸而刘文锦等人到武昌后，经革命负责同志劝告，以革命时机眼看成熟，随时可能举事，此际切不可远离驻地。刘文锦

乃诿称由商场得来行情，内蒙古本年马匹上市无多，难以选购好马，故暂不宜去。乃自武汉半途折返，更无须去总督官署换文，遂未中其奸计。

戊戌政变中谭嗣同惨遭西太后杀害。谭为浏阳人，其故里靠近长沙。梁启超来长沙时务学堂讲学，谭嗣同推介之力居多；谭本人的著作，亦已广为流传，使湖南社会上的风气为之大变。故对于谭的惨死，为之鸣冤与惋惜的人极多。西太后死后，宣统年间，谭嗣同的乡亲故友，在长沙公开设祭追悼，刘文锦送有祭轴一幅，上书“湘水无情”四字，此事表面上似与革命无关，但内实含有对满清政府深致不满之意，证明即使是保皇派中人，也看出清廷不足与有为，非进行革命不可了，当时在社会上殊有不少的影响。

新军中进步军官对兵士讲课，每次皆寻找机会，借题发挥，旁敲侧击，揭露满清政府的的黑暗腐败，激发士兵们的革命心情，日久习以为常。有次刘文锦到讲堂对士兵讲话，因言词激烈，士兵们听后群情激愤，以致起立高呼“赶走满鞑子，光复中华”。此事传到满清官吏耳朵内，大为震惊，即欲找刘文锦追查，但他们还来不及采取措施，革命就已经爆发了。

笔者与刘承烈、刘文锦为伯侄，与刘麦岐为父子。所记这些片断事迹，皆得之于老两兄弟的口述。但因历年太久，恐有不少遗漏与挂误之处，还请亲身经历辛亥伟大革命的先辈们赐予指正。

益阳市所属地区解放前文教事业之概述

张德阶

益阳市为旧益阳县县治所在地。原系推进全县政令、孕育资水文明之枢纽。自秦置县，汉筑城池，二千多年来，虽历经沧桑，原名未变。一九五二年改为市的建制，逐步扩大旧治所在之城区，南连北展，今除市区外，郊区已扩大为九乡一镇，面积共达三百六十九平方公里，人口三十六万，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巍然屹立，成为湘省重要城市之一。忆曩时之旧貌，顾今日之繁荣，顿觉红光耀眼，热浪奔腾，不禁而有乡关巨变、直上青云之感。然社会之演进，必有其兴衰更替过程，抚今思昔，是史实之所由来也。四十年代，余曾主掌益阳教育，历时六年，兹就今益阳市所属地区解放前之文化教育，追述梗概，以备参考。

一、教育行政机构的演变

自欧化东渐，中国教育随各种新生事物之兴起，有志之士，力主改革。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六年）八月，废科举，兴学校。自京师至地方，兴学之风，蓬勃发展。各县原有学衙之教谕，随废科举而一同裁撤，代之而起者为县劝学所。劝学所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管理全县学务（即县属各学堂），民国初年废立，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复设。

劝学所成立后，即以县知事（县长）为监督，另设总董一人总管各学区学务。各学区设劝学员一人，协助总董推行教育（后总董改为所长）。所有劝学所成员，非识时务，懂新学者，不能充任。益阳劝学所历任所长为罗德源（前清举人，曾留学日本）、曹明毅（或瀛）、夏赞熙（范庭）、刘涤非、周光汉等人。一九二二年因教育范围扩大，乃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设局长一人总其事，下设一课、二课、教产经理、督学、文牍、庶务等室，计划、设施、考核全县中小学教育，及县属校长教员进退等事宜。第一届教育局长为周则颐，大革命时系孙慕韩担任局长，大革命后，先后担任局长者为张蜚、夏鼎、周则颐、詹泽霖、胡文、刘策勋等人。

抗日军兴，为节省开支，减少人力，乃于一九四〇年将县教育局裁撤，改为益阳县政府教育科。设科长一人，干事一人，其职掌范围与教育局同。惟教产经理室仅收管学租与房租，产款列入财政预算统一支用，教育科仅有会同财政科、会计室审核之权。教育经费除开支县属各校经费外，其他开支，须受到一定限制。先后担任教育科长者有詹照、高绍廉、王维国（维立）、张德阶等人。

以上科局长中，以周则颐先生历时较久，贡献较大。大革命后，适值益阳团防局长曹明阵凶焰嚣张之际，他竭力诋毁新教育之推行，使人莫敢与之对抗。周先生挺身而出，力斥其非，一秉至公，维护新教育之发展。其在推行中心小学区，设立短期义校与民校及“小先生”制等事业上，亲自布点、筹划与考核，为当时开展扫盲工作，煞费苦心，业绩显著。

周先生长期从事教育，赞赏陶行和、晏阳初等人倡导平

民教育，以教育来改良中国。先生亦思以教育来改良益阳，任人唯贤，不拘各党各派。大革命前夕，他担任龙洲师范校长，教员中有张尚斌（后代校长）、袁铸仁、孙慕韩、田士清、何仁周、刘取元等人，或为地下党的核心，或为进步人士。马日事变复学后，曹明阵欲向龙洲师范进行清党运动，先生毅然屹立，毫不动摇，并向曹明阵发出警告："你不要干涉我的校政。"这种威武不屈、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人，亦足以昭于今，励于后。

教育局成立之后，为便于管理学校，于一九二二年将县属七个镇，各设学务处一所。下设主任一人，助理一人，学警若干人，督办各里、团学校。（其时益阳县分为二十三个乡里，"团"约相当于后来的一个保。）一九二八年随着镇改为区的建制，遂将镇学务处改为区教育委员办事处。设教育委员一人，干事一人，公丁二人。其时乡村教育尚不发达，教育委员职责，主要是取缔和改良私塾，鼓励新学，整顿学产，辅导学校。教员人选，多由教育委员推荐。今益阳市辖原之第一学区和第二学区之一部。一学区设二堡天后宫，二学区设城内考棚街。一学区教育委员较有成绩者为符涤源，符经常深入基层，勤于督促辅导。二学区教育委员较有成绩者为周先梯。周先生思想开明，乐于助人，大革命后，为保护地下党的同志，亦曾作出贡献。在任教育委员期间，励精图治，为整顿学产、鼓励兴学方面，较有成绩。

一九三六年撤销区的建制后，区教育委员亦随之裁撤。全县改为三十乡镇。每乡镇公所各设文化股主任一人，管理各公私立初级小学。以前的镇学务主任及区教育委员经费由县供给。后来的乡镇文化股主任则由乡镇开支。龙麟镇另设有

校产经理室，所有各保国民学校经费，统由校产经理室开支。

二、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废除科举后，县除成立官立小学堂（龙洲高小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外，城区设学，如雨后春笋。计有县立模范国民小学，乾元高小（后改为县立第一区高小），卜氏日知高小（设城内），求是高小（城内），四维、豫章、五福、仁德、信义、鄂材、江南小学（后改为二区高小）等。为适应小学师资的迫切需要，曾于猫咀冲设有乙种师范一所，后改为小学教员讲习所（龙洲师范成立后即停办）。抗日军兴，原县立第一区高小（乾元小学），改属龙麟镇，称为龙麟镇中心小学。城区各保共设有保国民学校十四所。新桥、护城、白乐、涧山、滨资等乡，各设有中心小学一所，保国民学校十至二十所。私立小学有声誉者有龚氏思齐小学、崔氏储英小学、鲁氏兴仁小学、陈氏集贤小学等。原宝庆府所属五县旅益人士所办的五福小学在原基础上于一九四三年扩办为五福中学，江西商界人士所办豫章小学，一九四六年扩办为豫章中学，两校仍附设小学部。还有学门口胡文忠公祠设有林翼中学（后停办）和省立第五师范附属小学（设孔庙旧址）。

益阳县立中学于一九四三年在王秉丞担任县长时即开始筹划，一九四三年七月，就学门口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旧址，正式招生开学，首任校长为谭得雄。由于日寇压境，几经播迁，惊魂莫定，教学未上轨道。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后，始由板溪久通公司迁入桃江桃谷山中心学校，假该校为临时校舍。一九四八年二月迁回益阳县城，与县立女子职业

学校合并，仍称益阳县立初级中学。女职学生除缝纫、会计两班修完各专业课程外，余均按程度编入县中各年级。历任校长为谭得雄（两任）、戴超、周秉圭、周光、徐广德等人。

三、女子教育的兴衰

县立女子职业学校，设在城内考棚街，成立于一九一九年。初时学生不多，仅有小学及缝纫班，后增设染织，不久又将染织裁撤。一九三九年胡建农任校长时，复办染织，并加设文书科。日寇压境，学校迁往大桥乡岩子潭，时仅有缝纫、会计两班维持现状。抗日胜利后，学校迁回原址，设有缝纫、会计各两班，附小仍照原设立。历任校长有曾纪镛、龚凝霞、张平治、胡建农、丁之煦、丁传一等人。其中曾纪镛先生为该校创始人。当时社会风气不开，上层人士多视女子教育为余事，曾先生力排众议，得到县有关方面支持，终于创建了这所学校。其后张平治任校长，学校趋于稳定，办得较好。胡建农长校时，立意改进，以日寇压境，有志难伸。一九四八年鉴于各校均系男女同学，无复当年闭塞，而县立中学又无固定校址，遂将该校并入县立中学。

信义女子师范，设在城内五马坊，创办于一九一二年，首任校长为挪威人贺哈拉。一九二六年停办，一九三五年拟复学，因与部颁规定不合，乃改为私立信义女子初级中学，一九四一年并入信义中学女生部。此后各校均开放为男女同校，女子教育，亦相应得到发展。

四、教会学校的兴起

信义小学是益阳最早的一所教会学校，创建于一九〇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